

【个人记忆】

□吕家乡

作为“摘帽右派”，有许多文件我无缘听取传达，偶尔听到一次则如获至宝。为了弥补听不到传达的不足，我就特别抓紧时事政治学习，反修的“九评”啦，毛主席对文教战线表示不满的一个个批示啦，姚文元批《海瑞罢官》的文章啦，我都认真阅读，务求“紧跟形势”。因此，当1966年6月初“文革”风暴呼啸而起的时候，我并不感到意外，倒是有几分兴奋，觉得表现自己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”的机会降临了。校领导第一次表态拥护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报告竟是我参与起草的。但是两三天后我的档案材料就以大字报形式公布出来，学生们知道了我的“摘帽右派”身份，立即义愤填膺地批斗我的“右派翻天”罪行，同时抨击校领导“重用右派，招降纳叛”。

我作为“群众专政”对象，多次挨过痛打和凌辱，蹲过“牛棚”(禁闭)数月，又被“监督劳动”数年。我受到了“高天滚滚寒流急”的摧残，也感到了“大地微微暖气吹”的抚慰。妻子(小学教师)受我的连累也遭到大字报围攻，对我却从无怨言，总自责对我照顾不够。在我遭到第一次抄家后，短期客居，和我同住的年逾古稀的老母被赶回老家，而且不准我请假护送，母亲临别时嘱咐我：“阴天要当晴天过，晴天要当阴天过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”在大串联期间，已经上了大学的往届生曾有两三批到“牛棚”来看望我，仍然亲热地叫我老师，表示不会忘记我认真教学付出的心血……这些都给了我无形的力量，使我打消了轻生的闪念，增强了“挺下去”的决心。1971年林彪事件后，学生复课，革委会让我重上讲坛，同时教5个班的语文课。我一面教课，一面挨斗，就是说，上一节课是语文课，我作为教员在台上讲课；下一节课是“大批判”课，我就站在学生面前低头弯腰，接受学生的批斗。文化教员和反面教员集于一身，双重角色在同一个学生面前交叉上演，这种体验可谓百年不遇，这种景象可谓教育

【生活直击】

□刘天放

以前的大学里极少有逃课的大学生。再远的就不提了，就说离我们较近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吧。《北大回忆》的作者张曼菱在讲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大时称，当时的学子们在燕园总能有幸听到一些名教授的课，如王力、吕祖缙、林庚、朱光潜等。而那时要想听这些老师上课，学生们上课前就跟“打仗”一样去提前占座，上课像过节一样。她说得没错，就是普通老师授课，学生们也都能积极参与，绝无逃课现象。哪怕有临时开办的讲座，有时间的话，大家都尽量省出时间前往聆听。

也是，当时的大学老师，多是刚刚从政治运动中走出来，靠拨乱反正才重返讲台的一些民国时期培养出来的大师，名家、教授们还健在，他们学问高深，甚至学贯中西，听他们的课让人受益无穷。那也是刚结束“十年动乱”的年代，大家的心气儿很高，不仅老师们自由度大，政治逐步走

《归来》观后感自沉吟(下)

如今，在思想解放的春风吹拂了三十多年之后，回顾“摘帽右派”岁月里自己的种种表现，深感愚昧可悲。



史上的奇观。

邓小平同志复出，大抓“整顿”后，学校秩序逐渐恢复正常，我的处境也有所好转，校领导让我担任了“副班主任”，1976年又让我担任了班主任。我全力以赴地投入教学和班主任工作。但政治风向变幻不定，大家正在为邓小平的整顿叫好，忽而又开始“批邓”和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，还有批儒评法，评水浒，批宋江等等，和教育战线直接有关的则有对白卷英雄张铁生、反潮流的小学生黄帅的宣扬。上级只要有指示，就不能不响应、拥护。我唯恐犯方向路线错误，终日提心吊胆，战战兢兢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严重影响了工农业生产，对此我是有切身感受的。大约是1976年夏天，我借了一辆地排车去买蜂窝煤，我和妻子轮换着排队，等了两天两夜(其间还淋了一场雨)也没有买到，后来还是托人走后门才买到。可是“最高指示”总是说“形势大好，不是小好，越来越好”，我对此也是深信不疑的。我认为自己看到的只是局部的表面的现象，而领袖却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，这正说明领袖的英明。

“文革”期间曾经流行“踢开党委闹革命”口号，这和当年反右派运动中的说法“反对党支部就是反党”迥然不同，因此曾经一度掀起右派翻案风。我也蠢蠢欲动，由于亲友的坚决制止，没敢有所行动。后来翻案风被打了下去，参与翻案者受到了惩处，我庆幸自己没有卷入，由衷感谢亲友的劝阻。有一次在“斗私批修”会

上交了内心曾有的翻案想法。有的人说我是借着“斗私批修”的名义来放毒和试探，不过军宣队并没有采纳。“文革”即将结束时，给我做了“不再重新戴上右派帽子”的政治结论。1978年冬，我听说中央下发了“55号文件”，要重新审查反右派运动的问题，这当然是我梦寐以求的，亲友们也纷纷劝我提出申诉。可是我想到风向多变，害怕偷鸡不着蚀把米，害怕一念之差会使多年的改造成绩付诸东流，因此不敢轻举妄动。直到山东医学院“55办公室”的焦科长来找我，问我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看法，我还吞吞吐吐。他明确表示我属于错划，可以改正，我才敢提出申诉。1979年1月24日，中共山东医学院核心领导小组下达了为我“改正错划右派、恢复政治名誉”的通知，真让我感激涕零。

如今，在思想解放的春风吹拂了三十多年之后，回顾“摘帽右派”岁月里自己的种种表现，深感愚昧可悲。那么，我能不能早一些觉悟呢？平心静气地设想一下，在我那种身份、那种思想基础、那种处境下，阅读范围仅限于上级规定的学习材料和公开报刊，没有任何另外的思想资源，突破愚昧状态、识别路线错误的觉悟是根本不可能有的。再进一步设想一下，假如我较早地觉悟到路线政策的失误，结果会怎样呢？也许不只会感到鲁迅所说的“觉醒之后无路可走”的痛苦，而可能有类似张志新的遭遇(虽然不会有张志新的境界)吧。

愚昧之外，我还做了些亏

心事。如果说愚昧可以原谅，亏心事却是不可原谅的。

1964年春天，山师中文系的学生到附中实习，我负责指导四人，其中常效同学承担讲授的课文是杜甫的诗篇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，规定是用两个课时。他竟讲八句诗很难填满两个课时，我让他要“放得开”，可以结合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旁征博引，打开学生的联想和想象空间。他在讲课中果然这样做了，课堂效果不错。但在评议时山师中文系的带队教师却认为他的讲课有严重偏向：不能紧扣课文；而且，带队教师认为，脱离课文的几个例子大都是我建议常效全讲的。我内心对带队教师的意见是不以为然的，但考虑到自己的政治身份，既不敢据理力争，又不敢承担“指导不当”的责任，眼睁睁地看着常效全评了个较低的实习成绩。不知这成绩对他的毕业分配是不是有所影响？

1965年寒假，我校开展了“四清”运动，我是全组第一个重点批判对象。我过关之后，全组把批判重点转向X×X的“经济不清”问题。这时校领导郑重地交给我一个任务，要我为批判X×X做重点发言。我问有什么具体材料，校领导说：当然有材料，但是现在不能告诉你，你主要是狠打他企图蒙混过关的态度，火力一定要猛，这是领导上对你的考验。我果然做了一篇空洞无物却声色俱厉的发言，从挨整者轻而易举地变成了打手。但直到运动结束，X×X的问题也没有什么结论，不了了之。

一方面下决心“老老实实认真改造”，时时提醒自己“千万别再犯错误”，一方面又做出这样的亏心事，可见这“认真改造”、“不犯错误”都是要加引号的，其实是把利害之心置于是非观念之上，坦诚、正直的为人品质都可以弃之不顾了。当时也感到纠结，但不敢深究。直到“改正”、“归来”后，才开始清理和洗涤心灵上的这些污垢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

从“占座”到“逃课”

大学生不愿意上课，甚至厌课、逃课成风，究竟说明了什么？该反思的，恐怕不该只是大学生、大学教师或者学校本身吧？

向开明，社会的宽容度较高，全社会也都呈现出一种向上的力量，对学术研究、独立思考、精神追求等有一种全民喷发的势头。用邵燕祥的话说就是“有限度的复活”。

本人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，九十年代初开始在校教书，也是个从“占座”到“逃课”的见证者。好在我的学生基本上给足了我在面的子，我的课堂鲜有逃课现象。但据我观察，自从上世纪末至今，逃课现象已极为普遍。以前大学生上一些老师的课要占座，而如今却堕化到要“逃”的程度，真令人感慨，叹息、惋惜！观现今的大学校园，逃课已成一大风景，学子厌学成风。别说是正常之上课，就是有什么著名专家、学者、教授们开讲座，也早没那么火爆了。即便有师生前来捧场，现场听众也是稀稀拉拉。如果看见有成群而来的学生，也多是院系辅导员代发的强制性行政命令的结果。目前占

座现象也存在，甚至很疯狂，可惜不是为了听课、听讲座占座，而是为了考研。

无独有偶，作家蒋方舟笔下《我承认我不曾经历沧桑》中的清华校园，也是逃课成风，学子们少有对学问的探索和对精神的追求，反倒是对房地产、就业、赚钱、竞选学生会干部、各种资格考试等情有独钟，并为此不停地奔波。她坦言，现在的大学与社会早已没有区别，标准一样，模式一样。《寻找北大》的作者钱理群教授称当今大学生多是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，他们(学生们)“高智商、世俗、老到，善于表演，懂得配合，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，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”。

从“占座”到“逃课”，如今的大学何以如此？是大学生们变得更势利、现实了，还是大学教师们的授业本领降低了，没了吸引力？是整个学术或社会环境使然？抑或是我们的大

学在学业导向、课程设置，尤其是在大统一的模式下与大学精神的逐步矮化有关？这恐怕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。说到底，恐怕还是大学对学术、独立、斯文、民主、风骨等的坚守少了，反倒对献媚、应景、造假、忽悠等的追捧多了。学生逃课不好，可是反问几句：大学的课程设置合理吗？教师们的授课有知识含量吗？包括大学教师在内的大学以及教育主管部门的创新性何在？否则，学术造假、大学衙门化、金钱主义盛行以及罕有重大基础性研究突破等，就不会那么遭人诟病了吧？

大学生逃课，这话听起来令人感到十分费解，可这就是残酷的现实。大学生不愿意上课，甚至厌课、逃课成风，究竟说明了什么？该反思的，恐怕不该只是大学生、大学教师或者学校本身吧？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(威海)翻译学院副教授、文化学者、自由撰稿人)

文同(1018-1079年)，字与可，是苏东坡的表哥，也是他的挚友，还是苏东坡画竹的老师。文同竹子画得好，开始自己也没觉得有多珍贵，但各地前来求画的人越来越多，还都捧着上好的细绢，排着队请他画竹子。文同不胜其扰，恼了，把那些绢都扔到地上，说，画、画、画，这怎么画得完？你们再拿这些绢来，我就做袜子穿了。他要是真做了袜子，估计就是最早的丝袜。后来，文同从陕西洋州调回京城，苏轼赴任徐州知州，文同给他写信说，近来我告诉那些士大夫们，我们“墨竹一派”已经到了彭城(徐州)，你们可以到那里去求画，估计那些做袜子的细绢以后就都汇集

【宣纸上的故事】

苏轼有个表哥叫文同

□李北山

到你那里了。他在信末还写了一首诗，其中两句说：“拟将一段鹅溪绢，扫取寒梢万尺长。”鹅溪在今天四川的盐亭西北，是文同的老家，自古盛产作画用的名绢。他的意思，是要用故乡的名绢为苏轼画一幅万尺长的墨竹。当然是好朋友开玩笑而已。苏轼回答说，你要画一万尺长的竹子，还不得用二百五十匹绢？要不这样，我也知道你懒得动笔，你就把这二百五十匹绢送给我就行。被将了一军，文同说，跟你开玩笑呢，这世上哪有万尺长的竹子？苏轼说，这个可以有，“世间亦有千寻竹，月落庭空影许长。”文同又回信说老苏你真狡猾，要是二百五十匹绢，我早就买田置业回家养老了。不过，他还真随信寄来一幅竹子，这就是著名的《筼筻谷偃竹》图，并在信中说这幅竹子只不过数尺，却有万尺的气势。文同赠给苏轼这幅图可是别有深意。

原来，筼筻是一种高大的竹子。顾名思义，筼筻谷就是以这种高大的竹子而得名，就在陕西洋州。宋神宗熙宁年间，文同在洋州做知州时，喜好种植花木，修建园亭，他还喜欢就各处景物逐一题咏，写了《守居园池杂题》诗共三十首。他寄给苏轼，苏轼逐一唱和，也写了三十首，这就是《洋州三十咏》。《筼筻谷》为其中的一首。文同的《筼筻谷》诗是这样写的：“千亩翠羽盖，万铸绿沈枪。定有葛藤种，不知何处藏。”说这谷中竹林繁茂，俯瞰，犹似千万顶碧翠的车盖；平视，宛如武侯架上矗立的万杆长枪。其中定有葛藤湖中化龙的神竹，只是不知它藏在哪儿。苏轼回文同的诗说，你别跟我整这些竹化龙什么的，故弄玄虚玩高雅。你那里到处都是竹子，也不值钱，你们的斧头肯定不会放过那些美味的竹笋(箨龙)。可以想见，像你这又穷又馋的太守，恨不得把渭川的千亩竹林都吞到肚子里(汉川修竹贱如蓬，斤斧何曾赦箨龙。料得清贫馋太守，渭滨千亩在胸中)。收到苏轼的信时，文同正和夫人在谷中游赏，烧笋当晚饭吃，打开信看到诗，禁不住大笑，把嘴里的饭喷了一桌子。“喷饭”就是这么来的。从这个故事不难看出，这筼筻谷的竹子是他们生命辉映的见证，自然非同一般。一般画竹都是高直不折，文同却画了一幅倒伏的竹子相赠。苏轼的一生历经坎坷，大半是在贬官和流放中度过，“偃竹”大概就是苏轼身飘零、命运起伏的况味了。这也是告诉老苏：我懂你。

若干年后，元丰二年(1079年)七月七日，苏轼晾晒书画，当他见到这幅《筼筻谷偃竹》图时，一时呆在那里，痛哭失声。半年前，就是这一年的正月二十日，文同死于陈州，如今，还有谁能懂我？此时，苏轼在湖州任上，被人诬陷，说他所作诗文有毁谤朝廷的意图，他被捕入狱的圣谕正在路上。次年他被贬黄州，在那里度过了他人生最为悲苦的时段，也同时写下了《赤壁赋》、《后赤壁赋》和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等千古名作，还有传世名篇《寒食帖》。

这些故事就记载在苏轼所作《文与可画筼筻谷偃竹记》中。千年之后，《筼筻谷偃竹》图已然湮灭于时间的洪流之中，但这篇至情至性的文艺随笔依然在告诉我们那些名画背后的故事，告诉我们那些伟大的艺术生命，告诉我们那些令人动容的感情。

(本文作者为艺术学者)